

戴嘉艳 / 著

生存智慧 与文化选择

——达斡尔族农业民俗
及其生态文化特征研究

SHENGCUNZHIHUI

YU WENHUAXUANZE

— DAWOERZU

NONGYEMINSU

JIQI SHENGTAIWENHUA

TEZHENG YANJIU

民族出版社

戴嘉艳 / 著

生存智慧 与 文化选择

——达斡尔族农业民俗
及其生态文化特征研究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存智慧与文化选择:达斡尔族农业民俗及其生态文化特征研究/戴嘉艳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7

ISBN 978 - 7 - 105 - 13333 - 8

I. ①生… II. ①戴… III. ①达斡尔族—农业生产—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IV. ①K892.29 ②K892.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0710 号

策划编辑:虞农

责任编辑:朴雪梅

封面设计:金晔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址:<http://www.e56.com.cn>

印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次: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221千字

印张:8.625

定价:25.00元

ISBN 978 - 7 - 105 - 13333 - 8/K · 2347(汉 1307)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序

戴嘉艳的这部专著是在她的博士论文《达斡尔族农业民俗及其生态文化特征研究——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阿尔拉镇为个案》的基础上写出的。达斡尔族是我国北方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在东北地区，与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一起被统称为“三少”民族。其族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契丹民族。从历史到现在，达斡尔族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创造并且传承了自己的生计方式，达斡尔族传统的生计方式是我国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构成共存共生的关系。但是长久以来，学界尚存这样的现状：对于多元文化的理论理解得不够，对于作为“边缘文化”的各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研究得很不充分，尤其是对于东北地区的“三少”民族关注得更少。作者力图打破这种封闭状态，这本专著呈现的是对于达斡尔族独特的农业民俗的研究。

民以食为天，我国是农业大国，我国的农业民俗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农业生计方式是民俗文化研究最基础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部分，其他的民俗事象，诸如社会民俗、信仰民俗、娱乐民俗都脱离不了生计方式的背景性知识，世代传承的农业习俗不仅维持了达斡尔族的日常生活世界，而且惯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本专著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选取我国达斡尔族的主要聚居地——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一个典型的农耕村落为个案，对达斡

尔族农业民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它主要涉及：（1）达斡尔族耕作传统与技术方式的研究；（2）农具制作使用技术民俗的研究；（3）农业时序节令的观察和相应农事节律的研究；（4）农事信仰、禳灾仪礼民俗事象研究。作者通过田野考察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建构了达斡尔族农业民俗的基本文化体系。对于达斡尔族农耕村落的农业习俗做较详尽的个案研究，目前可能尚属首次。特别是在工业化的今天，当传统的农业习俗在迅速转型的过程中，课题本身无论是对于有生命力的传统的研究，还是对于今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建树都是有价值的。

应该说，对于我国农业习俗的各种民俗事象的研究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出现了一批学者，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出现了一批有相当质量的博士论文。这本专著的可贵之处和学术创新点不仅仅在于取材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其独特的视角。专著没有停留在一般常态的对于达斡尔族农业民俗的描述上，不可否认，田野民俗志需要描述，但是描述的背后，我们追求的是“将反思文化与生长文化相比较，探索本土文化的本质”。作者为了达到民俗志的书写目的，较好地采用了生态民俗学的视角，在20世纪20年代，生态学在人类学中的重要价值和地位早就被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所表述。他倡导文化人类学的目的就在于：“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文化新貌和模式的起源。”专著摒弃了对于达斡尔族农业民俗的浅近记录，站在民俗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把握达斡尔族农业生态的特征，把达斡尔族的地域生态特征与达斡尔族的农业习俗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达斡尔族农业民俗的形成和传承受到我国东北地区生态环境所提供的生态资源与生态制约的双重影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这样的资源与制约中，达斡尔族的民众利用可能的资源做出了自己适合当地生态状况的文化选择，构建了一系列独特的农业生产与生活习俗。作者把握了达斡尔

人所选择的农业兼牧业等产业的多元文化格局，并对于这样保持生态环境的文化格局进行了合理的评估，以此确立了达斡尔族的农业习俗在中华农业格局中的地位。

达斡尔族农业村落的信仰是其农业生态文化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专著把达斡尔族的信仰仪式与其农业民俗水乳交融地联系在一起研究，为研究农业村落的信仰文化提供了新的落脚点和透视点。总之，在惯习与生态之间进行了互释性研究。作者阐明了文化层是通过生态环境建构起来的，离开特定的生态环境去谈文化的建构是不可能成立的，是要遭到质疑的。生态环境提供的资源与民众通过文化选择建构的传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构成互动互存的关系。作者把文化生态学纳入生态学的理论和概念之中，可以说这样研究达斡尔族的农业习俗是一个可喜的突破。

群体的民俗文化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对于达斡尔族农业民俗的研究即立足于当代谋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现实。众所周知，当代世界面临着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深刻矛盾，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失调，面对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迫使人们反思自身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重新审视“传统”的价值和定位。这就是专著研究的当代意义。作者的思考是与当前人类发展的思考与忧患意识同步的，这可以看出民俗学者的情怀。

作者本身是回族，由于民族生活习惯的缘故，深入达斡尔族村落做调查存在的困难是不言自明的。从调查到成文，这是一个身心历练与感悟的过程。通过田野调查她收获甚丰，如将其在论述中加以更充分的展示，并在已具备“在场”实践的基础上增强对“在场”体验的书写，专著则会更显功力，希望作者在今后的新著中带来新的呈现。

邢 莉

2014年1月于中央民族大学

前 言

农业民俗是传统农业时期，广大农耕民众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通过观察、体会、感知和思考，以认识自然、探索规律为基础，逐渐形成的传统文化习俗。它与农耕民众的生存需求和心理需求相适应，既包括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也包括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农事信仰和祭祀活动。其中包含着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成分，也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相生相谐的依存关系。本书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选取一个典型的达斡尔族农耕村落为个案，以生态文化特征为视角，运用生态人类学的相关理论着重考察其农业民俗的表现形态、社会功能、生态价值和发展变迁状况，从而揭示农业民俗的本质以及生成、演进的基本规律和相关文化内涵。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从生态认知的角度对达斡尔族岁时节令、耕作传统与生产技术俗制等农业民俗事象进行描述和分析，从中认识达斡尔族农耕民众在与自然环境的适应和互动中进行文化选择与民俗建构的基本情况。第二，通过对农事信仰中所包含的生态动因和生态思维、观念的探讨，了解民众在农耕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精神联系的内涵和本质。第三，结合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变迁情况，揭示达斡尔族农业民俗发生嬗变的事实，进而就现代语境下如何继续发挥其固有的生态文化功能和实现生态价值的全新提升，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思考。

结合特定地域和族群对农业民俗所做的整体研究得出如下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和结论：传统社会中农业民俗稳定传承并充分发挥其文化功能，实质上体现了人与自然互动中的适应关系和和谐状态。当今，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环境资源和发展方式问题，引发人们对农业民俗所包含的知识经验和生态智慧的省思与拾取，促使新型农业在更高层次上向传统生产方式的回归，意味着现代民俗观的重塑和人与自然之间原本具有的那种相依存的精神联系得以再度加强，从而有机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 录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生态视域及其对农耕文化 的学术观照	(1)
第二节 以生态人类学为路径的农业民俗个案研究	(22)
第二章 村落的自然生态、社会环境与生计方式	(39)
第一节 达斡尔族东北居地的自然生境和社会历史	(39)
第二节 村落生态状况与农耕生计方式	(53)
第三章 农业生产技术过程民俗与民众生态认知 的文化表达	(70)
第一节 生态适应与文化选择：耕作传统及相应俗制	(70)
第二节 农具与耕作技术民俗及其生态特征	(88)
第三节 对自然节律的生态感知与作物种植 和收获习俗	(100)

第四章 农事信仰及其生态内蕴·····	(116)
第一节 农事信仰及其生态动因·····	(117)
第二节 农事禳灾与民众生态观念的内化和彰显·····	(131)
第五章 生态环境变迁与农业民俗的嬗变·····	(156)
第一节 自然环境恶化与农业生态困境·····	(156)
第二节 人文生态变迁与农业民俗的式微·····	(165)
第三节 农业民俗的嬗变与走向·····	(182)
第六章 回归与重塑：以传统生态智慧烛照 农业现代发展·····	(198)
第一节 对传统农耕知识经验的省思与拾取·····	(198)
第二节 生态建设与科技培训促进农业新习俗的形成·····	(205)
第三节 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在更高层次上 向传统生产方式回归·····	(219)
结 语·····	(240)
参考文献·····	(253)
后 记·····	(26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生态视域 及其对农耕文化的学术观照

人类、文化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题之一。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学术背景和人文科学研究跨文化视角及多学科结合的发展趋势影响之下，文化人类学研究中不仅汇入了生态学观念和理论方法，拓宽了研究视域，同时也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加强了对与环境因素相关的文化现象的研究。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非常显著，伴随农业长期发展所形成的农耕文化因而即是适应和改造环境过程中的文化产物，对它的考察和认识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普遍受到重视。同为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的生态人类学和民俗学从各自学科特点出发，都对农耕文化开展了相应研究，给予了必要的学术观照。前者主要探讨农耕生计方式所涵盖的耕作制度、生产方式、土地利用、环境适应和社会组织等问题，为便于讨论，本书将其归纳为“农业社会研究”；后者则着重以农业民俗等传统文化事象为研究对象。在此结合这两个分支学科的自身发展状况，通过对国内外相关

研究进行综述，试做梳理和说明。

一、生态学观点的引入与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构成

追溯起来，生物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初是从自然科学领域展开的。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 Haeckel）提出“生态学”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是研究（任何一种）有机体彼此之间、以及与其整体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学问。”从一开始，生态学关注的就是共同体、生态系统和整体。^①这门专注于生物及其生存环境生物学关系研究的学科最初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的影响日益显著，促使许多人文学科诸如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也纷纷介入人类文化及其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之中，生态学界的一些概念和原理也开始被运用到人类社会研究领域，由此创建和发展起来一系列相关分支学科和理论模式。

其中生态人类学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虽然“生态人类学”一词是1968年由美国学者维达和拉帕波特首次提出的，但学界普遍认为美国人类学家、新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J. H. 斯图尔德是生态人类学的开创者，他1955年出版了《文化变迁的理论》一书，被视为文化生态学诞生的标志，而生态人类学正是由文化生态学发展而来的，它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类、生态环境及文化之间关系的一门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以下结合生态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了解其基本理论构成，从而认识这

^① [美] 纳什著，杨通进译，漆治平校：《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66～67页，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转引自王正平：《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一学科的特殊学术贡献与影响。

生态人类学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主要理论包括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主义、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论、生态系统论以及民族生态学。其中环境决定论与早期西方社会思想中的相关理论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古希腊学者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理论被视为最早的环境决定论，他认为气候决定人体内特定的几种体液的相对比例，进而决定人的体格和人格。依据体液理论发展而来的环境决定论认为环境是决定人类社会和文化特点的关键因素，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习俗等文化特征和社会结构都可以通过所处的自然环境得以解释。其合理性在于充分认识到环境对人类社会产生着重要影响，但它过于强调简单的线性因果决定关系，而忽视了人、环境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类学界的环境决定论认识受到环境可能主义的修正。美国历史特殊论学派的开创者博厄斯主张文化特征和文化模式的起源应归因于历史传统而非环境，但他并非完全忽略环境对文化的影响，认为环境只是在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水平上起到一定限制作用，它只指示事物的可能性。因而环境可能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较弱的环境决定论。^①虽然它缺乏对人类社会及文化多样性加以解释的潜力，但在对于环境和文化关系的认识上已开始由决定论向互动和辩证的观点转向，因为它既看到环境能够为文化提供一定的可能性或可供选择的机会，又看到了文化本身具有从中做出选择的能力。

斯图尔德在他的《文化变迁理论》中提出了“文化核心”的概念，特指“与生计活动和经济安排有最密切关系的特征丛”^②，

^① 参见李霞：《生态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载《国外社会科学》，2000（6）。

^② [美] J. H. 斯图尔德著，玉文华译：《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载《民族译丛》，1988（6）。

是文化中易受环境因素影响的部分。他强调具体的环境模塑着特定的文化特征，认为某一文化现象是某种特定的生态特征的产物，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由社会与环境相互影响的特殊适应过程引起的（地形、动植物群的不同，会使人们使用不同的技术和构成不同的社会组织）。^① 他确立了包含三个基本步骤的文化生态学研究方法：第一，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相互的关系；第二，分析以一项特殊技术开发一特定地区所涉及的行为模式；第三，确定环境开发所需要的行为模式对其他文化层面的影响程度。^② 斯图尔德通过深入研究美国内华达州的西部肖肖尼人的居住环境与生产生活情况对上述方法做出有力说明。

文化生态学开辟了人类学关于生态研究的新局面，从一个新的视角，把文化与环境联系起来创建了学科理论，这一理论也因此常被称为生态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贡献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强调环境与文化不可分离，两者之间不是线性的因果关系，它们相互界定，彼此关联，共同构成辩证的互动体系。其二，所倡导的对地域集团的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进行深入研究的方法论，成为此后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其后，M. 哈里斯通过追溯各种技术、居住模型、宗教信仰与仪式等文化特征与环境之间的关联性，论证所有文化特征都是适应环境的产物，都具有适应环境的生态意义，由此揭示了其中的唯物合理性，这一理论主张被称为文化唯物论。生态人类学发展至此，已由早期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主义等理论派别侧重于从自然

^① 参见宋蜀华：《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族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见《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74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② 参见[美]史徒华(J.H. 斯图尔德)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49-50页，台北，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89。

环境条件阐释文化形态与结构，转向为结合生态环境条件、运用生态学原理进行文化解析。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系统生态学和民族生态学发展成为生态人类学领域的主要理论学派。其中前者因1963年格尔茨首倡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运用生态系统方法而逐渐形成。该学派采用了生物学中的系统概念，注重人类活动的物质后果，研究人作为有机体与生态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进行物质交换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虽然在研究方法上对人类学传统范式有所突破和创新，但仍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由于生态系统途径有浓厚的生物学色彩，这样就难以避免以下缺陷：由于过分关注环境（受达尔文主义支配的生物学强调环境的决定性作用）而倾向将文化从人类学的研究中排除出去。”^①

而民族生态学则是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其主要任务是描述人们对其自身环境模式的理解”^②。尤其对特定文化传统中的生态知识给予关注和重视。在方法论上强调从被研究者的角度而不是以研究者的观点界定知识体系，认为环境不是一个实在，而是人类感知与解释外部世界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因此，不同的人群对自然环境有不同的解释。

综上所述：“生态学的引入也为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增添了新鲜的、科学的视野，对传统的单纯文化解释文化是一种校正。”^③从此，生态学观点和方法成为人类学家认识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由于在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中把与生计活动最密

① 李霞：《生态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载《国外社会科学》，2000（6）。

② [英]凯·米尔顿著，袁同凯、周建新译：《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对环境话语中的人类学角色的探讨》，63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③ 蒋俊：《生态人类学概论》，载《青海社会科学》，2007（4）。

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特征视为“文化核心”，将文化核心跨文化的相似性作为学科研究的重点，由此所确立的详细研究地域集团的生产方式和生息环境的方法论，成为后来生态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因此，将狩猎采集民族、农耕民族和畜牧民族的生计方式以及各社会群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作为重要研究对象。而对本书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的农业社会或农业生产方式的研究在生态人类学研究中就涉及较早。例如文化生态学在利用历史文献、考古学著作或口述史资料等对史前农业灌溉系统、非洲农村生活在若干个世纪内的变化等情况作过详细研究，并试图以此为依据，了解地区和社会的“生态变迁”。其中斯图尔德的相关研究最具影响力，他曾对东西半球五个最早的文明区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秘鲁和墨西哥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各地的水利措施与耕作制度等农业生产技术要素在文明区崛起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并直接促进了当地相应的社会政治、军事制度和文化习俗的形成。文化生态学有关农业社会的研究，往往通过对不同耕作制度的比较，把人口密度等因素与耕作方式、生产强度和支撑这些耕作制度的社会组织形式联系起来加以分析阐释，在研究方法上显示出一定优势。自从格尔茨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倡导并应用生态系统方法，生态人类学侧重于生产方式研究的学术传统才发生根本改变。格尔茨将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有活力的分析单位，1963年，他对印度尼西亚农业发展进行生态人类学研究的新作《农业过密化》发表，“以其对那里农村社会、生态、文化系统的互动关系的系统分析而成为生态人类学的早期经典”^①。也被看作生态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国外生态人类学界关于农业社会的研究方面，日本学者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20世

^① 崔延虎、海鹰：《生态人类学与新疆文化特征再认识》，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

纪60—80年代,日本生态人类学研究领域对非洲土著农业生活与食物结构问题较为重视。通过田中二郎在《生态人类学》一文^①中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所作的简要回顾,我们既了解到日本学者关于苏丹萨凡纳地区的农耕民兰巴人的作物种植与蛋白质摄取、扎伊尔农耕民博耶拉人猎捕动物或昆虫补充饮食蛋白以及坦桑尼亚的刀耕火种农耕民通格韦人自给自足的生活和相应形成的与贫穷环境的适应性等研究个案,也可从中看出生态人类学研究对农耕民生产方式和与之密切相关的营养平衡问题的高度关注。

由于农耕生计与环境之间具有特殊的密切联系,生态人类学关于农业社会的多角度研究,一方面能为理解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更为直接的认识途径;另一方面,还可以透过相关民族的文化特征与文化逻辑去获得其农耕生计方式的本原意义。

二、生态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 与农业社会研究

20世纪80年代,生态人类学随着人类学在中国的整体复兴而正式起步,在初期阶段对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和深入理解的基础上,逐步走上致力于本土化研究的发展之路,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 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和评介

最初以译介一些国外生态人类学著述的篇章为主,如 R. McC.

^① 参见[日]绫部恒雄编,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115~126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